

拨云透雾话“秋霞”

张昊

秋霞圃坐落在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街道东大街314号。东靠秋霞公寓,西毗陆少艺术院,南傍东大街,北依启良路,占地3.28公顷,总建筑面积3950平方米,其中景点面积2400余平方米。它集始建于明代龚氏园、沈氏园、金氏园和城隍庙于一体,是沪上五大古典园林之一。四五百年间,这“三园一庙”迭经兴衰;而龚氏园、沈氏园和城隍庙更是物换人非,颇多变故,三者既有自成风景的年华,亦有合二为一的岁月。

——摘自《秋霞圃志》(2008年版重修本)

秋霞圃故事中的不寻常

四十三年前,即1981年暑假,在中学毕业五年后,我们班搞了一次返校同学会。那时秋霞圃的重修、重建工程正在进行中,在原音乐教室门前的工地上,同学们兴致盎然地留了影。后来才听闻这所留下我们许多记忆的老房子原名叫碧梧轩,门前废池则称桃花潭,潭边沿南北假山有过更多佳构,各具美名。我们当年那几帧留影“不可多得”地见证了这所园子的此番变迁,然而在我心里,我还一直将早已恢复古典名园身份和面貌的秋霞圃,看作是我的中学校园。前几年,当我起念要再写一写曾经的中学校园时,事与愿违,我写出了秋霞圃。

之后我就注意到,秋霞圃的故事中最不寻常的,是在它作为私家园林的两百多年间(1502—1726),其园主居然在龚氏和汪氏两家之间两度变换。据2008年版《秋霞圃志(重修本)》(下同)记载:

龚氏园系明代工部尚书龚弘第宅之后园,即秋霞圃前身,始建于明正德嘉靖年间(作者按:一说始建于1502年,明弘治十五年,龚弘辞官返乡之时),时园内景物不见著录。嘉靖三十四年(1555),龚弘曾孙龚敏卿(又名敏行)为家奴所害(一说死于盗事),家道中落,遂售宅园于徽商汪姓。万历元年(1573),敏卿子锡爵赴乡试乏资,向汪添价,汪答,价不可添,秀才若中举,宅园可无偿退还。是年锡爵中举,汪果然

践诺。万历崇祯年间,锡爵子方中常邀“嘉定四先生”唐时升、娄坚、李流芳、程嘉燧和客居嘉定的名士宋珏、马元调在龚氏园会文唱和。时园内有丛桂轩、浴德堂诸胜。清初,清兵三屠嘉定,龚氏后裔龚用圆、龚用广等10余人与侯峒曾、黄淳耀一起守城,英勇殉节。龚氏因此再次衰败,其残存的宅园复归汪姓。

短短一节文字,概述了龚氏宅园先后两次易主汪姓徽商的故事。在后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背后,实际有多达12名龚氏族人殉节,龚用广的儿子龚元防在殉难前还留下一首《石冈别》,文中有“双眼泪尽继以血,垂向江边哭父烈”。下自注:“母与弟妹避地石冈,七月二十七日兵猝至,同殉于此。”

对事实真相的质疑和推断

我最初读《秋霞圃志》中这段文字,在感佩嘉定龚氏“再次衰败”的原因时,却也特别觉得前一个故事过于离奇,内容显见有穿凿附会之嫌。后经考据研究,我最终对这一故事列出如下几处质疑:

其一,关于龚氏宅园何时售于汪姓徽商,据查最早记载此事的嘉庆《嘉定县志》卷八“第宅园亭”里,只说龚锡爵成年后,从收养他的舅舅沈兆家返乡时,“其城隍庙西故宅已售一徽商”,并未说明售出时间和经手人。此后史志传记中的相关说法,则是时隔越久情节越丰,益显“演绎”特征。据此可知,所谓汪姓徽商在龚家遭难时“趁火打劫”压价购入龚氏宅园的推测未经实锤。

其二,龚锡爵之父龚敏卿的死因,查到最早的记载出现于明万历《嘉定县志》卷十二“隐德”中,是“死于盗”,后来演变为死于“奴变”,然后顺理成章有家仆李崧于月黑风高夜,背负幼主龚锡爵逃离“奴变”现场的情节。即使是这样,那时龚家已失户主,是谁能出售龚氏尚书园于汪姓?

其三,从清康熙《嘉定县志》、清光绪《嘉定县志》等史志所记龚锡爵做人为官的事迹看,他是一个正直、刚正、品位很高的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

很难想象他会去向多年前已由自家长辈售出之宅园的买主要求“添价”。何况龚锡爵那次是“赴乡试”,明朝乡试试场通常安排在地方上,所费不多,即使“乏资”,名门后代也不至于去动那种歪脑筋。

其四,清康熙《嘉定县志》、清光绪《嘉定县志》中,均有关于在清初第二次接手龚氏宅园的汪氏后裔汪凤来(字于梧)的小传,赞誉他乐善好施,这一描述的确也符合当年一般成功徽商的品行。从汪凤来的祖辈在龚锡爵中举后送宅园的义举看,他也不是等闲之辈,对龚锡爵所求之事,资助在先更合情理。

综上所述,并以与故事人物同时代的明万历《嘉定县志》卷十二“隐德”等为主要依据,分析当年情况,我推断事情真相应该是这样:1555年某月某日,已故工部尚书龚弘曾孙龚敏卿,意外死于盗事,遗子锡爵,时年只有五岁,便成了孤儿,人身安全堪虞。其舅沈兆时客居常州金坛,得到噩耗后,随即派人联系到龚家仆人李崧,由李崧悄悄带着锡爵投奔沈兆处。沈兆对锡爵视如己出,“抚而教之,凡十五年”。龚锡爵成年后,沈兆将他送回嘉定老家,并资助他自立门户。三年后,即1573年,龚锡爵中举,次年又中进士。在此背景下,此前已购得龚氏宅园的汪姓徽商,主动提出要将龚氏宅园物归原主奉还给龚锡爵。其实,当时的龚氏园并非豪宅,建筑简陋,“白门土垣而已”,只是它对龚家有着特殊的意义。另一方面,在龚锡爵连中举人、进士后,这座原尚书宅第也更添分量,汪姓徽商此时将它“物归原主”,正合题中应有之义。

为什么后来会出现言之凿凿、离奇却为人乐道的“添价”之说?这应该是和市井中对商人的成见有关,而史志编纂者亦未能免俗。在“添价”之说的背后,是对汪姓徽商“趁火打劫”的暗示。无怪乎虽然汪氏经营秋霞圃近百年,然而在史志中提到秋霞圃的这段历史时,它的园主始终有姓无名。据嘉定地方文史研究者朱怀兴考证,嘉定历史上私家园林不下百所,像这种



秋霞圃一角 李琦/摄

园主有姓无名的情况堪称绝无仅有。上文提到清代两部《嘉定县志》中皆有汪凤来(字于梧)小传,但文中看不出他和秋霞圃的关系,而能为他列传,赞誉他乐善好施,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子焘,壬辰武进士。”他的儿子汪焘中了武进士。

清初秋霞圃的第一代园主

嘉定地方文史研究者朱怀兴是在清诗中发现这个汪于梧就是清初秋霞圃的园主,同时也是龚氏园正式有园名秋霞圃后的第一代园主。这并非偶然,当年那些关于秋霞圃的诗词的主要作者:山东莱阳宋琬、苏南江阴邓仲麟、浙江余杭严沆、苏州吴江赵云等,他们都不是嘉定人。这明显不同于前朝龚锡爵的儿子龚方中经营园子那会儿,常来园中雅集、会文唱和的多为本地名士,如“嘉定四先生”唐时升、娄坚、李流芳、程嘉燧等,可见园子在清初再度易主汪姓徽商,此事或许并不待见于本地“大方之家”。

而这也导致这事给汪于梧的影响,是他请来的宾客多来自各地,且有多人贵为进士,如宋琬、邓仲麟、严沆,而他们也都没有辜负园主的盛情。据《秋霞圃志》记载,龚氏宅园正是在这个时期被扩建为园林,不仅有了正式园名,也逐渐有了桃花潭、结庐人境、莺语堤、寒香室、岁寒径、数雨斋、题青渡、池上草堂、延绿轩等二十余景,“极一时之盛”。

而上述三位进士留下的诗词,有邓仲麟的《秋霞圃诗》、严沆的《赋秋霞圃》、宋琬的《集汪于梧秋霞圃分韵二首》《秋霞圃杂咏十五首》等。

清诗中蕴含的桃花潭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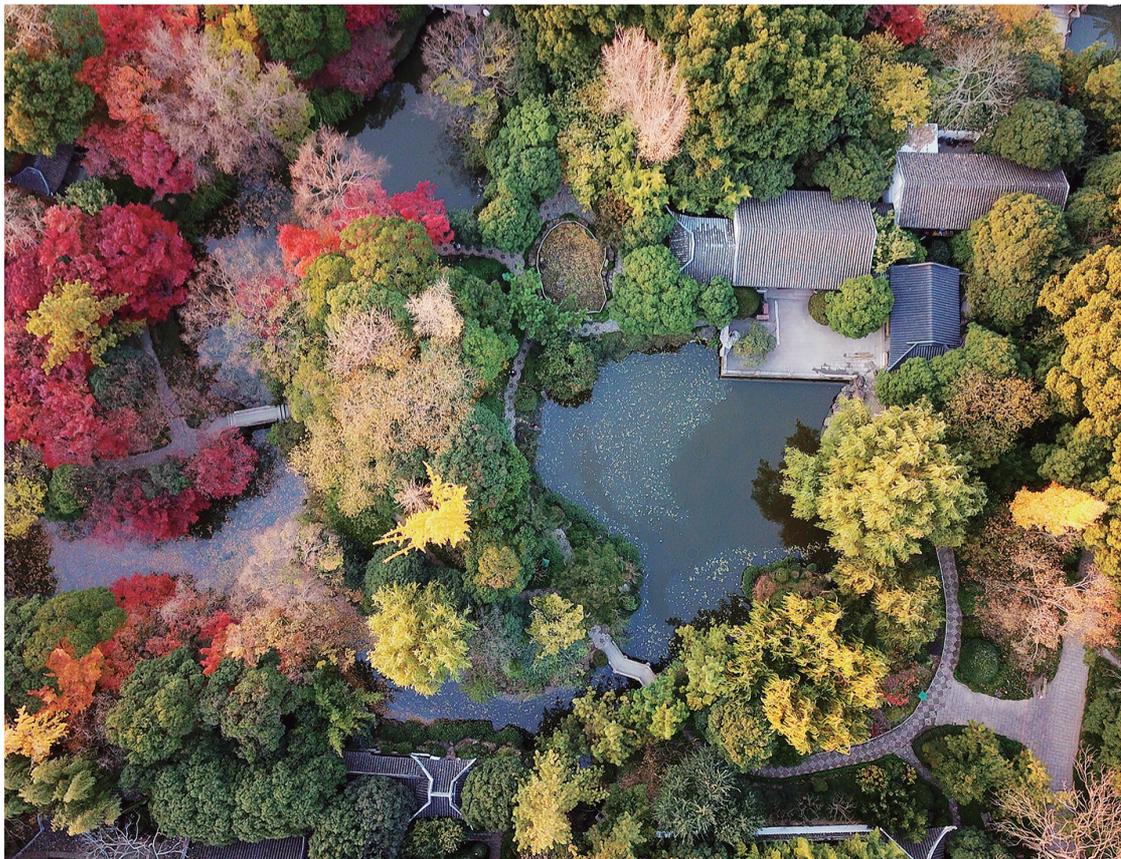
今天的秋霞圃分为四个景区:桃

花潭景区、凝霞阁景区、清镜塘景区和城隍庙景区,其中桃花潭景区所在位置就是过去的龚氏园,也是汪氏园。

嘉定地方文史研究者朱怀兴曾在他的《秋霞圃有密码,藏在清诗中》一文中提出一个疑问:桃花潭命名的依据是什么?不仅今天的桃花潭畔并无“桃红柳绿”,而且据朱怀兴考证,清诗中虽多有描写秋霞圃桃花潭的,但也都未写到桃树。如清宋琬的《秋霞圃杂咏·桃花潭》:“碧水映朱鳞,荇藻清如鉴。渔夫扣舷时,犹疑落花片。”在此诗的描述中,“朱鳞”“荇藻”是实景,“花片”是虚景,只因划船在桃花潭中,便有“犹疑落花片”的幻觉。

倒是在清严沆诗句“桃花潭水鹤江涓,秋圃汪伦寄宅时”中,透露了桃花潭命名的密码:这一有名无实的命名,却是为引导后人联想到李白《赠汪伦》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汪于梧和汪伦,一样姓汪,同是安徽人。已预知将来的史志也不会待见汪氏园的汪于梧,当时采用的表达方式,独特、含蓄,合乎文学和园林的语言,为后世留下一段佳话,也说明了他的为人。上文也说了,后世的几部《嘉定县志》中,有汪于梧传,果然没有提及他和秋霞圃的关系,不过倒是也盛赞他的为人。

1726年后,汪氏秋霞圃和毗邻的沈氏园、金氏园一起归属城隍庙,作为城隍庙的后园。其间细节状况,今已无考。今天的秋霞圃,则已包含上述四园,更被誉为“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一”,重焕青春,闻名遐迩。



秋霞圃 李华成/摄